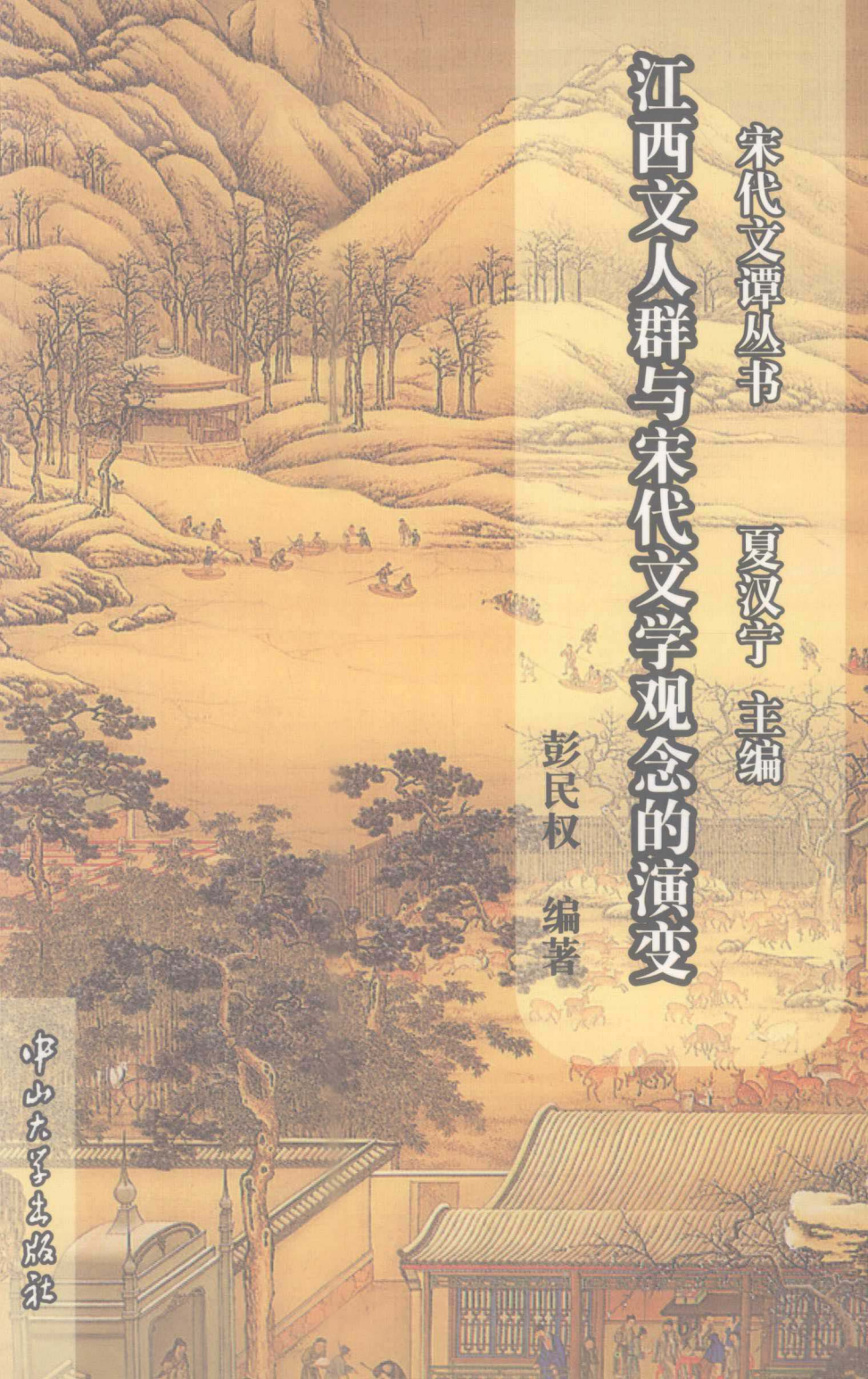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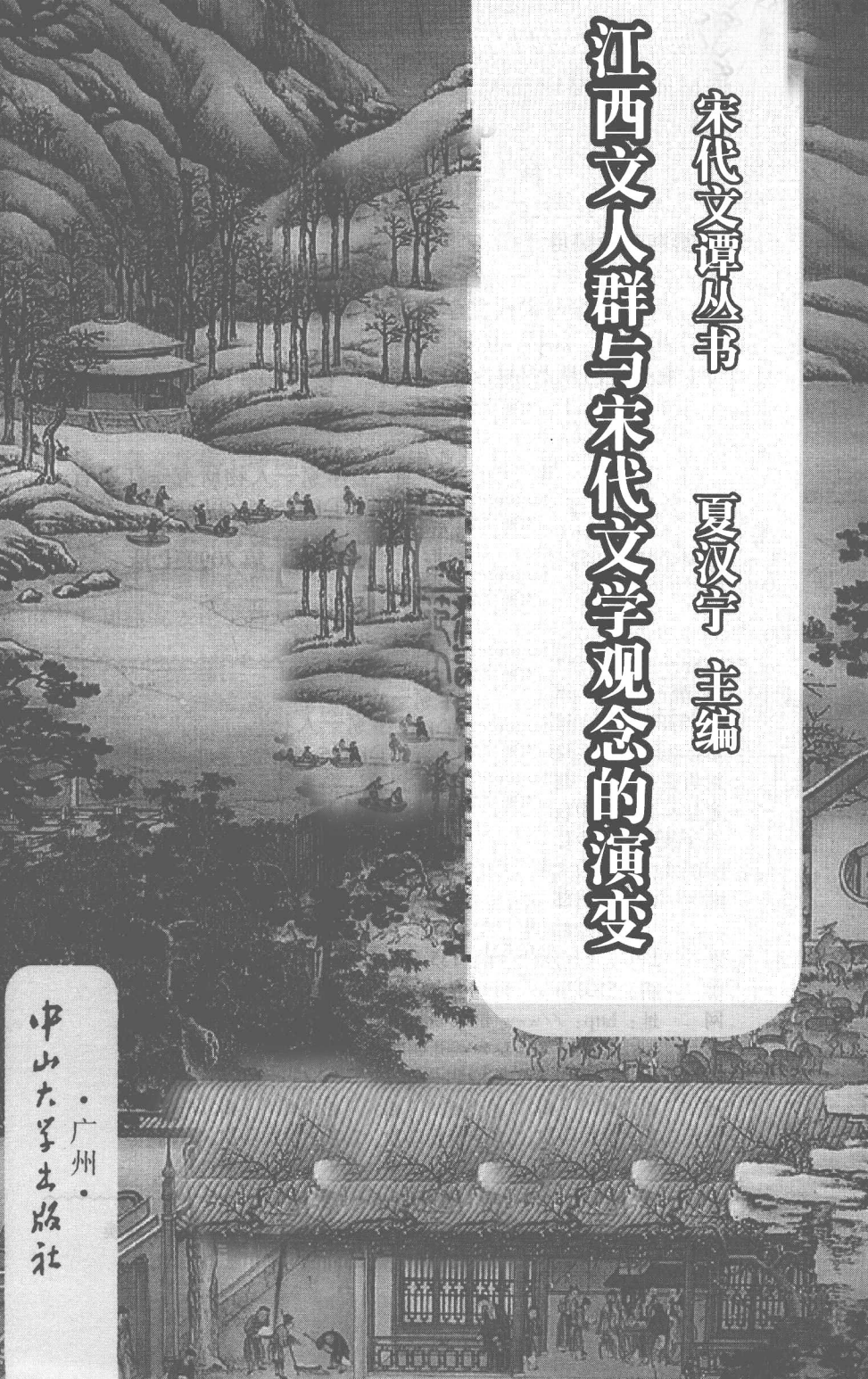
宋代文譚丛书

夏汉宁 主编

江西文人群与宋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彭民权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壇叢書

夏漢宇 主編

江西文人群與宋代文學觀念的演變

· 廣州 ·
中山大學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西文人群与宋代文学观念的演变/彭民权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10

(宋代文谭丛书/夏汉宁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054 - 1

I. ①江… II. ①彭…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江西省—宋代 ②古典文学—中国—宋代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931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丁 俭

责任编辑: 丁 俭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陈中新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10.75印张 2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彭民权（1980— ），男，汉族，湖北监利人。2003 年毕业于湖北三峡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师从李春青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诗学。当前供职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曾在《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总 序

夏汉宁

宋代文化向为学界所关注。早在 20 世纪初、中期，学术界就有不少前辈和大家将目光聚集在宋代文化上，如，陈寅恪先生就曾对宋代文化、宋代学术、宋代史学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他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寺〉序》中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在《略论稿》中又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在《赠蒋秉南序》中，除了推崇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外，更对宋代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故天水一朝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陈寅恪更是对宋代文化赞美有加，提出了一个至今为人乐道的精辟观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同是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还曾预言，中国学术文化“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再如，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写道：“若研究人心政俗不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家》一文中也认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金毓黻在《宋辽金史》中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前辈学者关于宋代文化的各种评论，都显示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宋代文化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正是在前辈学者精神的导引下，宋代文化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非常活跃的前沿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不说别的，单说宋代文化的研究丛书，就出版了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丛书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出版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而且还出版了“日本学者系列”，有学者称，《宋代研究丛书》“为中国宋史研究打响了鼓号，弹不虚发，都很解决问题，既可作为引路之作，又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值得庆贺。深为中国宋史研究取得的成果而雀跃”（王瑞旺先生语）。还有一套影响较大的丛书，那就是由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杭州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了50多本，据说还将继续编撰出版。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学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套丛书规模不大，水平之高，在该领域都堪称是一个创举”（陈祖武先生语）。……类似的研究丛书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评价了。

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既突出地方特色，同时又具有全国性意义，我们便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换言之，作为地方社会科学院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我们比较早地将视线聚焦在宋代文化研究上，并将研究重心确定在宋代文化和文学领域。对于这种选择，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围绕这个中心，多年来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编撰了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笔者就曾参与组织了各类与宋代文化有关的学术活动，像“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纪念黄庭坚诞生9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三晏学术讨论会”、“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学术座谈会”、“谢叠山诞辰770周年学术座谈会”、“文天祥学术座谈会”、“宋代地域文学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作为主编之一，还编撰出版了《宋代文化研究丛书》。进入21

世纪之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更是加大了对宋代文化研究的力度，将宋代文学研究列入了院重点发展学科，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给予有力的保障。

为了展示近几年在宋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我们策划了这套《宋代文谭丛书》。正如上文所说，当下关于宋代研究的丛书已有不少，如何凸显自己的特色就成为这套丛书的关键。为此，我们颇费了一些心思，最后决定将这套丛书的基点定位在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献校勘整理上。

之所以确立这个基点，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宋代是江西文化十分繁荣的时期，而文学的繁荣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仅以两宋江西文学家为例，据我们对《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所收录的文学家情况的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并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共有 16813 人，其中有籍可考的有 10263 人；在已知籍贯的文学家中，江西籍文学家就有 1322 人，占总人数的 7.86%，仅次于浙江、福建，居全国第三。在这 1322 位文学家中，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家庭特色十分明显。据初步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庭就有 106 家，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另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 400 部，其中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 83 部，占总数的 20% 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 157 家，其中江西籍文学家录 41 家，占总数的约 27%，而这 41 家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局面，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第二，江西在两宋时期是文坛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对出现于两宋文坛的这种“江西现象”，宋人不仅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发表了热情的赞扬以及理性的剖析。如，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这样说：“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断

丧萎荼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体，究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笃人也。至其他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黄次山在《重刻临川文集序》中称：“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仪》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时也说：“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第三，在两宋文化名人、文化大家中，有很多都是出自江西。仅举两个例子，即可略窥一斑：首先还是以文学家为例，在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擘不仅支撑起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其次以科举为例，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文献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 5545 人，其中 34 人文武科鼎甲，11 人为状元。科举的辉煌为江西文化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例如，在 1322 名文学家中，就有 644 名为进士；再如，在江西籍文化人中，有不少由科举走出江西而进入当时统治集团的高层。两宋时期，江西有 16 位宰执，北宋 6 位，南宋 10 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后，为江西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才把丛书的基点确立在对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献校勘整理上。于是，在这套丛书中，读

者便能发现，其中既有对宋代江西文化名人、江西文化现象的研究，又有对宋代江西文献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如果说特色的话，这当是本套丛书的最大特色吧！

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还想借此机会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对这套丛书的慷慨资助；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汪玉奇先生、副院长毛智勇先生和叶青先生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为丛书的出版精心编校，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总之，丛书的出版，除了作者的努力外，还与方方面面的关注、帮助密不可分，这正如常言所云“人人有惠于我”。

由于水平所限，丛书中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我们期待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3月28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序

李春青

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看上去不像前些年那样经常有热点问题出现了，学者们似乎都钻进了各自的“牛角尖”，对所谓“公共话题”不那么有兴趣了，整个学界让人感觉似乎有些过于平静，甚至沉寂。然而如果细心考察，则不难发现，其实人们的探索热情并未衰减，不仅研究的深度在不断推进，人们还在不断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文学地理学”就是近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渐渐受到关注的一门新学问。尽管这门学问还不够成熟，其具体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还在探索之中，但无疑已经呈现出不容小觑的发展趋势。在我面前摆着的这部书稿——《江西文人群与宋代文学观念的演变》，就是在“文学地理学”的启发下，再结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部著作选择活跃于两宋文坛的江西文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细致考察其文学观念生成演变的轨迹、特色及成就，而且力图揭示其在整个宋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清晰地勾勒出了两宋时期江西文人群文学观念之大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在考察文人群体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了那些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学观的重要性，对诸如晏殊、曾巩、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家族文学观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再可注意者，该著不囿于传统史学对人物的道德评判，对一些被判为“奸臣”者亦归于论列。如王钦若、陈彭年、夏竦诸位宋初人物就是如此。这些人在政治道德方面或许确有令人不齿之行，但俱以文才

名世，在文学观念上亦有一得之见，对他们的文学观予以阐述，可以全面而客观地揭示彼时之全貌。这也显示出作者的见识与勇气。

这部著作在资料搜集上亦颇下功夫，不仅遍览相关史籍与文人别集、诗话、词话等，对野史笔记亦多有采撷，故而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把握所论对象文学观念之全貌；另外，文笔晓畅、精练，无故作艰深之语，亦可称道。当然，如能在江西文人群之具体交往对其群体文学观念的细微影响，以及对宋代文学观念进一步细致全面的把握上更下工夫，当尤为可观。

这部著作的作者为供职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彭民权。他于200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在笔者名下攻读硕士学位。他为人质朴、平和，与人相处待之以诚，毫无心机；为学则善于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其硕士论文为《士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下的两汉庄学》，从选题即可见其志趣。2006年硕士毕业之后，他旋即以高分考上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依然在我名下攻读。又是三载寒窗，其学力与日俱增，渐渐形成自家气象。期间尝以助教身份协助我处理各种教学及科研事务，于我多有助益。其博士论文选题为《先秦文学中的楚国形象》，也堪称蹊径独辟之作。民权为楚人，于楚文化情有独钟，亦有楚人坚韧性格，若持之以恒，于学业一途必有大成。

六载光阴，忽忽而过，师生之间培养起了深厚情谊。回想当年切磋学问、教学相长，宛如昨日，想来令人怅然。现在民权的新著将要出版，做老师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草此数语，聊以为序。

2011年6月15日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总序	(1)
序	(1)
导论	(1)
第一节 文学地理学与文人群体研究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相关界定	(5)
第一章 北宋初期的江西文人群及其文学观念	(12)
第一节 王钦若、陈彭年、夏竦的文学观念	(12)
第二节 晏殊家族的文学观念	(27)
第二章 北宋中期江西文人群的文学观念	(49)
第一节 李觏及其弟子的古文理论	(49)
第二节 欧阳修与北宋古文运动	(63)
第三节 曾巩家族的文论	(113)
第四节 王安石家族的文论	(135)
第三章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文学观念	(151)
第一节 黄庭坚家族的文学观念	(151)
第二节 江西诗派的文学观念	(174)
第三节 南宋中期江西文人群对江西诗派 诗学观念的反拨	(190)

第四章 江西文人群与南宋后期文学观念的演变	(213)
第一节 江万里、欧阳守道的文学观念	(214)
第二节 凤林书院文人群的文学观念	(229)
第五章 宋代江西诗话理论	(251)
第一节 《六一诗话》与宋初诗风	(252)
第二节 《冷斋夜话》与江西诗派	(261)
第三节 《诚斋诗话》、《白石道人诗说》 与南宋中期诗学观念	(273)
结语	(294)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3)

导 论

第一节 文学地理学与文人群体研究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历经百年，中国文学史教材也有上百部。但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偏重于时间的叙述，对空间关注较少。近些年，学界开始逐渐关注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不断有新的理论尝试，陆续有学者提出诸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①、“空间叙事学”^②等理论构想。“文学地理学”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其对文学与空间地理关系的关注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有一些学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进行实践并取得一些成果。

在中国，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论述。当代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相关研究，但真正以“文学地理学”命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世纪之交有学者“倡议建立一门介于历史、地理、文学之间的新的边缘学科——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③，2003年李浩教授在论文《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中鲜明地提出“文学地理学”这一名称^④。一直

① 参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② 参见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③ 参见卞孝萱：《〈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简评》，《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参见李浩：《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到近几年，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开始逐渐增多，成果也颇为丰硕。然而，我们看到，虽然不少学者宣称从事的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但从其具体研究内容来看，他们所理解的文学地理学并不相同，有些甚至彼此互不认同。

究竟什么是文学地理学？对于这个问题，梅新林教授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中已经做出了回答，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①。这个回答看起来清晰明白。但当我们面对具体的研究时，就会遇见另一个困惑：具体来说，究竟什么样的研究属于文学地理学？梅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指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 作家籍贯地理；2. 作家活动地理；3. 作品描写地理；4. 作品传播地理。也就是说，凡是从事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称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杨义先生称其提倡的文学地理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地域文化，第二是家族文化，第三是作家的人生轨迹问题，第四是文化中心转移的问题。应该说，他们的探索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不少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正是朝着这些研究方向努力。然而，他们所列出的研究范围仍然相对抽象与模糊，有些更是过于宽泛，在界定什么样的研究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时仍然显得力不从心。

就当前的理论构想而言，文学地理学虽以空间地理为基础，但其重心仍然表现在对作家的研究上，包括他们的籍贯地理及其背后的地域文化、作家的活动与流向等等。在梅新林教授与杨义先生的体系中，作家的活动、流向与文化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因而对文人群体的研究十分重要。梅新林教授在《中国文学地

① 参见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

理学导论》中说：“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

本书对宋代江西文人群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前文学地理学理论构想的启发。但当前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实践操作还很不完善，理论构想与具体操作之间存在很大的断裂。一方面，当前的文学地理学体系建构看起来很完美，有些理论体系甚至提出了具体操作的构想。但另一方面，当真正按这个理论构想来实践操作时，却往往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也就是说，当前的文学地理学从命名、研究对象到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理论探讨，但这些探讨仅仅限于理论构想层面，要想实现它却十分困难。

以对文人群体的研究为例。梅新林教授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中对文人群体的研究这样定位：“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这一定位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也有一定的操作性。但真正进入具体研究阶段，仍然困难重重。

首先，要面对文人群体的界定问题。在现当代文学中，文人群体相对好界定，文人流派与团体往往有公开宣言、组织结构及

出版物等直接表明身份的资料为明证，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等等。但在古代，文人群体相对模糊，他们更多的时候并没有这种身份认同，而且联系也相对松散，用现代文人群体的特征为标准是很难去界定的。例如宋代的“江西诗派”，虽然以宗派的命名出现，但这种命名是吕本中及后人所为，吕本中之《江西诗社宗派图序》所列包括黄庭坚在内 26 位诗人并没有自称“江西诗派”；后人又将吕本中、曾几等人列入江西诗派，但他们也没有自认是江西诗派成员。

其次，即使我们采用宽泛的界定来认定某一文人群体的存在，也面对资料不足的制约。尤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文人群体的形成、成员的构成、成员之间的交往，以及文人群体的变化与流动等问题，往往很难找到有力的资料证明。

再次，古代文人群体本身稳定性很差，流动频繁，用一个固定的地理空间很难对文人群体的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界定。如本书所探讨的宋代江西文人群，不少群体成员游历多个地方，受到多种地域文化与整个时代文化的影响，这些不同地理空间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明确，用某一地理空间来分块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且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基于上述不确定性所归纳出来的文化中心转移问题的结论就相当可疑了。如果仅仅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归纳某个时期某个地理空间出现多少作家与文人群体，进而判定该时期该地域文化的繁荣，却忽视背后种种复杂的因素，这样的结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因此，本书虽受到文学地理学的启发，但不会采用当前文学地理学理论构想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要得出宋代江西诗学发达等类似的结论，而是试图具体探讨宋代江西文人群的文学观念与整个时代文学观念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因此，本书对宋代江西文人群文学观念的探讨将主要采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梳